

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GAO MIN XIAN SHI NIANG
BA SHI SHUANNI DANNI
JIN NIANG WEN JI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编

綫装書局

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编

线装书局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
北京:线装书局,2006.6
ISBN 7-80106-594-8

I.高… II.郑… III.中国—古代史—文集
IV.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992 号

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作 者: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 郝文勉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社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设计: 北京九天常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

字 数: 5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6-594-8

定 价: 1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高敏先生简介：

高敏,1927年7月生,汉族,湖南桃江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58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师从唐长孺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郑州市社科联副主席。现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中国唐史学会顾问,河南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著有《云梦秦简初探》、《秦汉史论集》、《秦汉史探讨》、《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魏

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南北史掇琐》、《简牍研究入门》、《中华古史求索集》等多种学术著作。主编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秦汉卷》、《奸臣传》、《隐士传》、《〈三国志〉精言妙语》,点校了《授堂金石跋》及永乐大典本《河南志》,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先后获得国家、教育部及省级一、二等奖十余项。1986年被评为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秀指导教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0年被授予河南省首批优秀专家称号,同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至今。

目 录

祝总斌先生来信致贺·····	祝总斌(001)
踏遍青山人未老 ——贺敏兄 80 华诞忆当年·····	周呈芳(002)
炎黄阪泉之战质疑·····	朱绍侯(003)
中国大运河与运河文化·····	安作璋(007)
古代合浦史地杂谈·····	邹逸麟(011)
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定位问题·····	李振宏(014)
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 ——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	葛剑雄(023)
读高敏先生著《南北史掇琐》·····	杨耀坤(029)
高敏先生简牍研究述论·····	章义和 张晓东(034)
读高敏著《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	张泽咸(044)
读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	汤勤福(047)
校勘史略·····	郑慧生(051)
郑玄校《礼记》据文意以决不从或本异文考辨·····	杨天宇(061)
宋王叔边本《后汉书》识语·····	周天游(066)
《全汉赋》辑注班彪《冀州赋》疑议·····	王子今(070)
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研究之一 ——以游侠为中心的探讨·····	卜宪群(073)
论贾谊对待匈奴的战略思想·····	张荣芳(084)

汉初货币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

- 兼谈张家山汉简《钱律》问题·····臧知非(091)
- 论两汉循吏的儒学情结·····孟祥才(105)
- 说汉代火灾·····彭 卫 杨振红(111)
- 汉长安城规划思想辨析·····韩国河(136)
- 汉代“绣衣使者”试释·····黄今言(142)
- 尹湾名谒木牍研究·····蔡万进(152)
- “将田己部右侯”铜印与“河西农都尉”封泥考释·····李炳泉(165)
- 东汉时期的度辽将军·····张鹤泉(169)

- 从吴简蠡测孙吴初期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高 凯(179)
- 侨置的源流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胡阿祥(189)
- 《十六国春秋》的散佚与辑佚·····陈长琦 周 群(205)
- 读《洛阳伽蓝记》论佛教对河洛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薛瑞泽(212)
- 北齐流内比视官分类考述·····张旭华(220)
- 魏晋南北朝至隋禁毁讖纬始末·····吕宗力(235)
- 南、北朝在制度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略论·····牟发松(253)

- 北朝至唐中叶的河阳三城·····宋 杰(262)
- 隋唐律令的立法原理·····高明士(283)
- 唐代的“除陌钱”·····刘 森(295)
- 濒海的国度: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李庆新(300)
- 论中古寺院经济的特殊性及其在唐宋间的变化·····严耀中(316)
- 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

- 高敏先生访谈录·····刁培俊 韩能跃(324)

- 高敏先生著作及论文目录·····(337)

- 后记·····(344)

祝总斌先生来信致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贵院《祝贺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征稿通知，已于九月下旬奉悉，深感荣幸。高敏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当代史学大家，著述宏富，学术造诣极高，先生八十华诞我自应撰稿祝贺，无奈我原有一写了两年的稿子刚好于八月交出，要写新稿，一时实在想不出好题目，而且即便有了题目，从收集史料到撰写，以我年迈迟钝之笔，加上不会电脑，几个月内也远远无法完成，所以对这次征稿，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向您们表示深深歉意了，敬希原谅是幸！最后衷心祝愿并相信，以高敏先生崇高声望，这次《纪念文集》定会收到大量高质量论文，编辑出版，作为对高敏先生八十大寿献礼的。

此颂

秋祺

北京大学历史系

祝总斌

2005年10月24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踏遍青山人未老

——贺敏兄 80 华诞忆当年

周呈芳

高敏同志是我 1951~1955 年大学学习期间的同班挚友,虽然相隔半个世纪了,但回忆当年,如同昨日,历历在目。

高敏学习特别刻苦,是一位全优生,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的见识,已经显露锋芒,具有独特的见解,这不仅为全班同学所公认,也为老师所赏识,所以毕业分配时,著名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将他留作自己的研究生,重点培养。

高敏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佼佼者。在政治思想上,他一贯要求进步,申请加入党组织。在生活、学习、工作上,他很有规律,参加各种文体体育活动,代表班、系参加篮排球比赛。他与我二人组队,参加学校扑克比赛,1955 年上半年获得了武汉大学学生扑克比赛冠军。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外交学院跟随苏联专家当世界史研究生,后来支边到了内蒙古,只是在 1973 年返回母校途经郑州时与高敏见过一面,但我仍经常关注这位老窗友,对他的每一成就都感到由衷高兴,学习他奋斗不止的精神,拜读过他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2005 年 8 月初,高敏来呼和浩特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得知此事,我与老友舒振邦研究员专门去拜访,促膝谈心,格外亲切。交谈中得知,在“左”倾的蹉跎岁月,他被“红卫兵”三次抄家,历经磨难,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在科学的大道上继续奋勇攀登,更加令人钦佩;同时作为学弟,我也向他汇报了这些年来自己的工作。谈心结束依依惜别时,下面四句话随口而出:

珞珈阔别五十载,科学高峰大步迈。

秦汉史业胜秦汉,学盖五洲和四海。

郑州大学遵照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导,庆祝高敏先生八十华诞及高敏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并计划出版《祝贺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来函要我回忆与高先生的交往历程。对郑州大学深为赞佩,我义不容辞,特写下以上数语,作为对郑州大学的回响,作为对同窗老友高敏的祝愿。

2006 年 2 月于塞外青城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

炎黄阪泉之战质疑

朱绍侯

一般中国古史都记有炎帝、黄帝阪泉大战之事。战争结果,黄帝胜利,征服了炎帝部落。对于这一传统说法,我很早就有些疑惑不解。一,炎、黄两大族群都是从少典部落分离出来的。他们如有冲突,战争也只能在炎、黄两部落的结合点上去打,即在新郑附近或姬水流域、姜水流域去打,为什么要跑到河北涿鹿附近的阪泉去打呢?要知道阪泉是蚩尤的势力范围。《路史·后纪四》有“阪泉氏蚩尤”的记载,明确说明蚩尤是阪泉的主宰者,炎黄二帝跑到蚩尤控制下的阪泉去打仗,实在是令人费解。二,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后,两者成为死对头,为什么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后,就没留下一点仇恨的痕迹呢?相反后世的华人都承认是炎黄子孙,而不说是蚩黄子孙呢?最近读《绎史·黄帝纪》,从中受到启发,似乎解决了以上两点疑问。马骥写《绎史》集中很多史书资料,写《黄帝纪》也是如此。马骥把众多的史书资料排列在一起,便于读者对比研究。《绎史·黄帝纪》引《新书》曰:“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马骥评论说:“史注引作同父母弟。《国语》云:少典生炎帝、黄帝,成而异德,用师以相济也。贾谊《新书》盖本此。然炎帝传世,至末帝榆罔而亡,岂犹有兄弟黄帝存哉?此说未详。”从马骥的评论看,对炎、黄二帝为兄弟之说,已予以否定。其理由是炎帝传八世至榆罔已有几百年,怎么可能与黄帝是兄弟呢?马骥的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说炎、黄两大族群是从少典部落中分离出来的,是可以讲得通的。

马骥《绎史》又引《归藏》曰:“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意思是说可以战胜,但也要有祸灾。马骥对此评论说:“史称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本两事也,而诸书多言战炎帝涿鹿之野,当是舛误,或云蚩尤亦自号炎帝。”在这里马骥更正了《新书》、《归藏》所记“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或“战于涿鹿之野”的错误,明确指出黄帝“克炎帝于阪泉”和黄帝“擒蚩尤于涿鹿”是两回事,也就是说炎黄二帝是战于阪泉,而不是战于涿鹿,战于涿鹿的是黄帝与蚩尤。在马骥这段评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话:“或云蚩尤亦号炎帝。”这就又透露一个信息,说明马骥又认为与黄帝战于涿鹿(实是阪泉)之野的有可能是冒称炎帝的蚩尤。由此就给人一个启发,说明黄帝与炎帝并没有发生过战争,在阪泉与黄帝作战的是蚩尤而不炎帝。对此,马骥在引《周书》文字时,表述的更为明确。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海,司□□上天奠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乱,用大正顺天……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上引《周书》文字,由于有两处佚文,其真意已无法全部了解,但马骥画龙点睛式的评论,

却很能说明问题。“此说炎帝命蚩尤居少昊,而蚩尤攻逐炎帝,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复别命少昊也”。有此评论再细读《周书》原文,炎帝、黄帝、蚩尤三者的关系就明白无误了。即在炎帝当政时,曾命蚩尤镇守少昊之地。蚩尤不用命,反而驱逐炎帝。炎帝异常恐惧,于是就求救于黄帝。炎帝与黄帝联兵在涿鹿(阪泉)打败了蚩尤,平定了蚩尤之乱,由此炎帝自知已无力号令诸侯,遂让位给黄帝。黄帝遂代炎帝而为天子,这与《史记》所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是为黄帝”的情况相符合。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炎黄二帝并没有打过仗,是炎帝请出黄帝共同战胜蚩尤,故炎黄二帝并没有结仇,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蚩尤,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合情合理说明炎帝、黄帝、蚩尤三者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炎黄二帝阪泉之战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先引原文,再作必要的解释。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以上所引用的炎黄二帝阪泉之战的资料,是见于正史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以后有些史书如《通鉴外纪》几乎是全文照录,遂使炎黄二帝阪泉之战被传述下来。如果根据上引资料作出判断,可以说炎黄二帝阪泉之战比黄帝、蚩尤的涿鹿之战打得还要凶恶、激烈。黄帝动员了熊、黑、貔、貅、羆、虎六兽(实为六个部落的图腾名)来助战,而且是“三战而后得其志”。但细读《史记》原文,就会发其中颇有矛盾之处。如第一段讲“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说明炎帝神农氏已经衰弱,无力征伐互相侵害的诸侯。第二段讲“轩辕氏乃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说明黄帝代神农氏而兴起,用武力征服了诸侯,但对于为暴最甚的蚩尤,也无力征伐。这两段文字衔接紧密,顺理成章,然而到第三段却突然来了个“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从何说起?前已讲过“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弗能征”,说明炎帝已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怎么又突然又来一个“炎帝欲侵凌诸侯”,并引出与黄帝的阪泉之战?况且当时炎帝处于“天子”的地位,对诸侯作战也应称作“征伐”、“诛讨”,而不应叫“侵凌”。很显然这里的“炎帝”实际是蚩尤,即驱逐炎帝之后而冒用“炎帝”称号的蚩尤。如果能这样解读阪泉之战中的“炎帝”,所有的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接下来第四段讲“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这是黄帝与蚩尤的最后决战,黄帝大获全胜。这次胜利炎帝也有一份功劳,因为是炎黄二帝联合战胜蚩尤,当然是以黄帝为主,于是第五段就讲“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从此历史就由三皇末期炎帝神农氏,转入五帝时代开始的黄帝时期。

关于上引《史记·五帝本纪》一段文字,有人可能这样认为,《史记》是把神农氏与炎帝视为二人,这样看也就不存在矛盾了。但是《太平御览》卷七十七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这里把《史记》上的“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改为“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可见把《史记》上的神农氏与炎帝理解为一,并非笔者个人之管见,乃是古已有之。其实就是退一步讲,神农氏与炎帝并非一人,《史记·五帝本纪》那段文字也讲不通,因为炎帝既然称为“帝”,就是“天下共主”,他与神农氏有什么关系,既然是“天下共主”,炎帝又怎么可能“侵凌诸侯”,只有把“侵凌诸侯”的炎帝,解释为冒称炎帝的蚩尤,

才能一通百通。

关于炎帝(蚩尤)黄帝阪泉之战,有的史书记载在涿鹿,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我认为这是由于阪泉与涿鹿地理位置相近所造成的结果。据《晋太康土地记》记载:“涿鹿之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魏土地记》也说:“下洛城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这就说明阪泉与涿鹿相距只有一里地,黄帝与蚩尤战于阪泉,不可能不波及涿鹿,所以非常容易把阪泉之战混淆为涿鹿之战。

最后必须说明,对炎黄二帝阪泉之战持怀疑态度的并不始自今日,而是古已有之。南朝著名史学家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上》中,就把《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阪泉之事,就认为是黄帝战蚩尤。说“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把阪泉之战的“六兽”,说成是“四兽”,可能是因传说的不同所致,但其所指是黄帝战蚩尤应无疑问。《路史·后纪四》也提到蚩尤逐炎帝的事。他说:“帝榆罔立,诸侯携贰,胥伐虐弱。分二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颡(少昊),以临西(四)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以上引文由于文简意涩,难以通释其全文,但对其主要内容还是可以把握的。文中所说的帝榆罔,乃是八世炎帝的名号。榆罔继承炎帝之位后,诸侯互相侵伐,社会混乱,炎帝榆罔想整顿社会秩序,乃分设二正二卿,司百工,还命蚩尤驻守少昊之地,以临四方,但榆罔德薄,不能驾驭蚩尤。蚩尤不仅不遵命,反而起兵驱逐榆罔,自居涿鹿,兴封禅,而自号炎帝。这段文字最主要之点,是说明蚩尤不听炎帝调遣,反而驱逐八世炎帝榆罔,居涿鹿,冒称炎帝。由此可以推断,在阪泉与黄帝作战的是蚩尤而不是炎帝。对此罗苹关于这段文字的注文说的更为清楚。现先引其注文,再略作分析。

《史记》言炎帝欲欺凌诸侯,《大戴礼》言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后周书》云炎帝为黄帝所灭,《文子》亦谓赤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皆谓蚩尤。而书传举以为榆罔,失之。《集仙录》云黄帝克榆罔(罔)于阪泉,黄帝非与榆罔战也。至《世纪》(指皇甫谧《帝王世纪》)遂谓黄帝与神农战,而炎帝克蚩尤,非也。陆德明云:“神农后第八帝曰榆罔。时蚩尤强,与罔争王,逐榆罔,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此得之。”

罗苹在注文里批判了《史记》、《大戴礼》、《后周书》、《文子》、《集仙录》、《帝王世纪》等古籍关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或以蚩尤为榆罔(八世炎帝)的错误说法,唯独对陆德明说的“罔(榆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予以肯定,而说“此得之”。罗苹的意见值得重视。

已故著名史学家孙作云教授于1989年第1期《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的《蚩尤考》一文中,引焦贛《易林》“战于阪兆,蚩尤败走”句,认为“战于阪兆”,即史书所谓“战于阪泉之野”。又据崔述《古史考信录》言“炎帝在黄帝之后,未尝与黄帝有战事”,故孙作云先生得出结论说:“可见黄帝教六兽以伐炎帝之事乃为伐蚩尤之讹传。”我认为孙作云先生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以上论证了炎黄阪泉之战乃是黄帝与蚩尤战阪泉之误传。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准备把我论证过的问题,再概括地重述一遍,以便加深印象。

炎帝和黄帝是由少典部落分离出来的两个族群。炎帝族靠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首先强大起来,成为中原各族群的领袖。包括黄帝族、蚩尤族在内的各族群都要听从炎帝的号令。炎帝族的领袖共传了八世,到末帝榆罔时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黄帝族、蚩尤族发展强大起来,特别是蚩尤族凶暴侵袭诸侯,炎帝不能制。炎帝欲派遣蚩尤去驻守少昊之地。蚩尤不仅不服从调遣,反而起兵驱逐炎帝,而占据涿鹿,并冒称炎帝,或称阪泉氏蚩尤,雄据北方。炎帝斗不过蚩尤,就求助于黄帝。此时黄帝“修兵振旅,诸侯宾从”,势力强大,就接受了炎帝的求援。

于是炎黄二帝就联合起来,在阪泉打败了冒称炎帝的蚩尤,这就是阪泉之战的真相。不久,蚩尤再次作乱,炎黄二帝又联合起来大败蚩尤于涿鹿。这两次对蚩尤的战争,都是以黄帝为主力。炎帝自知实力,已不能再号令诸侯,于是就把“天子”之位让给黄帝。黄帝遂成为中原各族的共主。由于炎黄二族同出于少典部落,又联合起来两次大败蚩尤,并且炎黄二帝都担任过中原各族的共主,故深受中原华夏各族的敬重,以后并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大运河与运河文化

安作璋

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创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 486 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距今已有 2400 多年的历史。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以其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地开凿整修,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直至公元 1293 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终于完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纵贯南北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全长 1782 公里(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及其他局部地区的小运河未计在内),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举世闻名的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1914 年竣工,全长 81.3 公里)长 21 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1869 年竣工,全长 172.5 公里)长 10 倍,比这两条运河的开凿时间要早两千多年。至于中国大运河历经两千多年所积累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更是后者所望尘莫及的。

水道运输经济而省力,因此水道交通很早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但是,中国的主要河流绝大多数是东西走向,没有南北水道,这种横向封闭的自然水系严重地制约着全国各地的交通往来,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设法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从吴国开凿的邗沟起,此后有战国时期魏国在中原地区开的鸿沟,三国时曹魏在华北平原开的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吴国在江南开的破岗渚。但直到隋朝以前,这些运河规模都不大,而且互不连贯,时兴时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系统。因此,我们将这个时期所开凿的运河统称为早期的运河。

隋代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北方边防力量,从公元 584 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到公元 610 年(隋炀帝大业六年)20 余年之间,充分利用了过去开的运河和天然河流,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唐代的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只是作了局部的变更和整修。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

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联结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

北宋皇朝都开封,即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河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

与河北、京东、京西以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皇朝都杭州,偏安东南半壁,也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供运输。

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时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运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也使前代呈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的大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此后,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此同时,运河的开凿整修技术也日渐成熟,运河的管理更是日臻完善。这一时期,不仅在解决运河水源、保护河堤、开凿河道、利用各种闸、堰以控制调节运河水量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涌现出郭守敬、潘继训、靳辅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而且还完善了各个职责分明的运河管理机构,制订了较为严密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运河的航运畅通,极大地发挥着运河在漕运等方面的功能。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着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

首先,大运河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拓航道的同时,以消弥水患和引水灌田为主要内容的南北方农田排灌工程在各地大量兴建起来,使运河区域的水利田获得大幅度的扩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各类的水利田以及沿运地区的官府屯田和营田,等等,都有显著的增加。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更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更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也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大运河的贯通,也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在沿运地区尤其是运河两岸城市中百业俱兴,商业气息尤为浓厚,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如造船业、瓷器业、酿造业、纺织业、编织业、印刷业、造纸业、金属品制造业、生活品制造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等,蓬勃兴起。各种商业店铺数以千万计,商业人口大增,呈现出从业而聚、活动频繁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工商业文化。随着运河的贯通,也促进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南北(也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来往不断地将各地区的巨额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网络,打破了并改善着地域性商业的闭塞状况,使运河经济带在推动全国经济发展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厂和包买商,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从今日北京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点都是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成为运河上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

目的就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需求。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区域,每一代皇朝统治者也都要凭借运河这个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总揽大局,驾驭全国。同样,当皇朝递变与变革之际,发生在运河区域的战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最多,也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谁控制了运河,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谁就能建立起稳定的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历代皇朝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直至明、清两朝,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大运河的贯通,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又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其所以存在着文化上的多元化,是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社会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上的隔绝,这一切都足以造成了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合、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大运河的水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但对运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尤其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到中国,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及各地,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迁居于运河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内迁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区。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国外优秀的文化也传播到中国,不仅更加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部大运河变迁史,反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历代运河的开凿、整修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所以大规模地开凿、整修运河,常常在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时期;反过来说,运河的开凿和整修对国家的繁荣富强、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又起着积极作用。而当政治腐败、国家贫弱时期,不仅没有或很少有开凿运河的盛举,即使前代开凿的运河,也往往难以保全,而时常湮废。一旦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湮废,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或危害,甚至导致皇朝的灭亡。所以中国古代的运河问题,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也就是一个政治生命线的问题。

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黄河两岸的运河航道淤塞,河道废弛。这时清朝已进入腐朽衰败的阶段,内忧外患重重,根本

无暇顾及也无力解决运河通航的问题。到公元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廷下令停止各省河运漕粮,从此南北航运中断,清朝也走上衰亡的道路。民国期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都忙于内战,排除异己,镇压人民,当然也不可能对运河进行妥善的治理,运河各段终于任其自行废弃。

解放后,百废待举,百业待业,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 多年来,各级政府和部门不断投入巨大财力和人力对运河进行扩建。例如 1988 年,完成了苏北运河徐州至扬州段 404 公里的扩建工程,达到通航 2000 吨级船舶的标准。1995 年,京杭运河又被列为国家内河航运两横一纵两网的发展规划。1997 年底,江苏省境内 208 公里(即苏南运河)的建设任务顺利完成。2000 年,山东济宁至台儿庄段 168 公里三级航道扩建工程正式通航。2003 年,断流百年的运河通州段也重新通航。2004 年,京杭大运河经过五次大规模整治后,承担了华东地区大部分电煤运输任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运输航道之一。

运河不仅承担了繁忙的运输重任,同时还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京杭运河在我国内河航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苏北运河每年运输的货物已经相当于一条电气化铁路的运量,而苏南运河每年运量已超过一亿吨;京杭运河还承担着淮河、里下河、太湖等农业发达地区的灌溉和防洪重任。运河又是凝结着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沿河众多的历史名城、名胜古迹,拥有着丰富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旅游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重要的文化经济活动。历经沧桑,饱受风雨后的古运河,经过治理,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生机,对今后运河沿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现实见证,是保存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最丰富的文化长廊、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对于历代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笔珍贵的遗产,不仅需要后代子孙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而且迫切需要今人加以认真的发掘、总结、继承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附记:

高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简牍学和历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对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和高敏先生相交相知已有 20 余年之久,对其人品学识以及勤奋治学的精神和严谨的学风,一向十分敬佩,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多年交往,受益匪浅。今欣逢高先生 80 华诞之际,谨将我为《中国运河文化史》写的前言,略加修改,献上,以表示仰止之忧。敬祝高敏老兄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安作璋

2006.1.15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古代合浦史地杂谈

邹逸麟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置合浦郡,治合浦县,故址在今广西浦北县(治小江镇)南近合浦县界的旧州村。东汉六朝因之。唐后为廉州治。北宋开宝五年(972年)迁治今合浦县治(廉州镇)。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廉州合浦县入石康县。咸平元年(998年)复置,仍为廉州治。元为廉州路治。明清为廉州府治。两千余年来一直是岭南地区西部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历史上有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值得一谈。

一、关于西汉合浦郡治所问题。历来学者都认为《汉书地理志》所记郡国首县,就是该郡国的治所。似成定论。直至清人阎若璩撰《潜丘劄记》,始提出异疑,他列举了《汉书纪传》及《水经注》中涉及汉代郡国治所者,就中虽大多数即《地志》的首县,也是有少数非《地志》之首县,遂以为班志无义例,首县未必郡国治所。以后王鸣盛增加数证,助成其说。其后学者多从此说。然1952年严耕望先生撰《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刊《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市,联经出版公司,1991年)一文认为:“西汉二百余年中,郡国时有增省,区划时有变动,治所亦常有迁徙,班志乃末年平帝世一时之版籍,吾人不能据秦及汉初或中叶之事例以驳班志。”他认为班志郡国首县为治所乃平帝时制度。按:关于《汉志》郡国首县是否郡国治所问题,涉及面太大,不在此讨论。这里只讲合浦郡治所问题。《汉志》合浦郡首县徐闻,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水经·温水注》:“合浦郡治合浦县。”证以汉时合浦郡当治合浦县。严耕望先生认为:据《温水注》,合浦郡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海南岛上珠崖、儋耳二郡置于元封元年(前110年),殆乎同时而置。“合浦仅有今广东西南隅尽雷州半岛之地,其时合浦县既当郡之中央,又与郡同名,自为郡治无疑。然昭帝罢儋耳郡,元帝罢珠崖郡,而《地志》合浦郡有朱卢县,都尉治。《续志》作朱崖。吴卓信云‘盖即改改珠崖郡所置,是今之琼州一府为汉朱卢一县地也。’王先谦同。其说甚是。是西汉末合浦兼有今海南岛地,其时徐闻地当雷州半岛之顶端,地控海岛与大陆之要冲。又据《地志》,其地为海上交通之起点……吾人可以想象儋耳、朱崖两郡既罢为朱卢县,属合浦,则一郡中心为徐闻县,非合浦县,即就交通及军事控制言,徐闻亦远优于合浦,徙治合浦,亦理使然也。郦注叙事至合浦县亦带叙郡事,故不及徙治,不足据以驳平帝时郡治徐闻也。”(同上揭)1988年谭师季龙先生撰《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刊《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以详尽资料考订认为:西汉海南岛上儋耳、珠崖二郡,自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先后废弃后,就一直不属汉王朝版图,作为合浦郡属县之一的朱卢县实在今博白或玉林一带。直至隋大业六年(610年)中原王朝才复有海南岛地。至为确论。然则徐闻县地为合浦郡中心之说就难成立。然笔者认为珠崖、儋耳二郡废弃后,合浦郡治迁于军事前线徐闻亦非绝对不可能事。约当于王莽执政前,郡当复治